

民主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龚友德◎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大学面临的选择



民主中国

MINSHENG ZHONGGUO 主编 / 新望

中国大学面临的选择

龚友德◎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 013032579

G649.21
107



G649.21/107



北航

C164054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大学面临的选择 / 龚友德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12.11

(民生中国)

ISBN 978-7-5415-6407-9

I. ①中… II. ①龚… III. ①高等学校—发展—研究—中国 IV. ①G6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696 号

出 版 人 李 维 李安泰
策划组稿 李安泰 杨云宝
责任编辑 易 山
整体设计 高 伟
责任印制 张 旻 赵宏斌 兰恩威

民生中国·中国大学面临的选择

龚友德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eph.com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8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15-6407-9
定 价	39.00 元

总 序

宋晓梧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证实的政治定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提出了“图谋民生幸福”的目标，但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目标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时隔100周年，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会动摇，新一轮的发展将更侧重为民谋福祉。他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把人民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把人民的期待作为工作的动力，表明新一届领导核心继承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有决心、有信心，也有能力带领全国人民一起继续创造我们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改善民生与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放到一起，专列一篇（第八篇），明确“十二五”时期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是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等方面，提出要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

人民。这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题中应有之义，对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十一五”时期，我国民生领域及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例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 24% 的县，约 1.4 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从 4 亿人扩大到 8.35 亿人；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从无到有，加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4.32 亿人；企业职工连续 7 年提高退休待遇水平，年均增长 10%；大幅度提高了教育投入。在此基础上，“十二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加大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同时深化相关体制改革，建立相关的民生绩效管理机制。

财政部在 2011 年预算草案报告中提出，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保就业这三个方面投入的增长幅度都高于 16%，住房保障方面也达到 14.8%，主要基本公共服务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 2011 年 8% 的 GDP 预期增长幅度。如果在整个“十二五”期间大致保持这样的比例关系，将有利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快完成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的转型，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8 年，我国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保的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 29.7%，比人均 GDP3000 美元以下的国家平均低 13 个百分点，比人均 GDP3000 美元至 6000 美元的国家平均低 24.3 个百分点。现在我国国力增强了，这两年也加大了对保障民生方面的投入，如：2011 年人均卫生公共服务经费标准由 15 元提高到 25 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标准由人均 120 元提高到 200 元；加快城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工矿、林区、垦区等棚户区改造，2011 年达 1000 万套，改造农村危房 150 万户，等等。但从总体看，财政加大对民生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还是有较大增长空间的。

改善民生，投入很重要，同时还要进一步分析结构问题。而调整结构，有待于相关体制的改革以及相关机制的完善。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一些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存在逆向转移问题，即一次分配的差距，经过基本公共服务二次分配后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这种逆向转移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都存在。从“十二五”时期开始，应当扭转这种逆向转移的趋势，在改善民生、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方面要实行三个倾斜：向农村倾斜、向后发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同时，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结构

调整还要求相应调整中央与地方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财力关系，调整城乡分割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关系，调整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关系。显然，完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需要对现有体制进行改革。

先举一个不同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待遇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企业与机关退休人员养老金差距由 1990 年的 1:1.21 不合理地扩大到 2005 年的 1:2.1。2005 年以来，国家连续 7 年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待遇，投入不算少了，但仍难以平衡两种制度之间的差异，并可能引发不同群体之间待遇水平的相互攀比。2011 年“两会”后，我在云南的一次调研中了解到：经连续 7 年提高待遇后，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休后养老金不到当地一般小学教师退休养老金的 50%。从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出发，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建议尽早统一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不要再在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之间分别设计不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特殊性，可以通过企业年金或其他补充保险来体现。美国 1984 年、日本 1986 年统一了公务员与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近年来又有一些国家实行公务员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远大于其他国家，而且历史上国有企业的干部、职工与政府和事业单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分开搞两三套养老保险制度，给社会平添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矛盾和纠纷。“十五”和“十一五”规划纲要都提出要推进机关和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但因改革方向不明确，其推进步履维艰，建议“十二五”时期启动并完成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再举一个不同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需要调节的例子。“十一五”时期以来，各地区的经济实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各地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有相应的提高，这在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得到充分肯定。“十一五”时期，区域间公共服务差距有所缩小，但由于前一阶段各地偏重总量 GDP 或人均 GDP 指标，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没有提到应有的位置，致使居民收入一次分配的地区差距经过二次分配反而扩大了，这一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如：社区卫生机构覆盖率，2007 年一些地区达到 100%，而有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不到 30%；人均基本医疗保险支出，2007 年上海、北京、天津与江西、贵州、河南等地比，差距达 4~5 倍，北京基本医疗保险封顶线提高到

30 万元，西安 5 万元，南昌 3 万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平均缴费率，2009 年，广东 10.04%，辽宁 23.92%，而抚养比广东 12.14%，辽宁 44.58%。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要素还会向发展条件较好、回报率较高的区域集聚，区域协调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如果以人均 GDP 大体相当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衡量指标，那么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就是十分困难和相当遥远的事情。因此，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应当大大弱化 GDP 指标，突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公共事业和公共福利，所有公民享有同等权利，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要惠及全体人民。

因此，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分配将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首先，逐步将基本公共服务事权适当集中到中央，由中央统筹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并建立全国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经费保障机制。其次，按照均等化的方向，改革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各项制度，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尤其是加大中央财政对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转移支付，逐步缩小各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差距。可以先解决省、市、区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问题，进而解决地区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促使政府履行保障和改善民生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应当考虑建立相关绩效管理机制。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行政府绩效管理和行政问责制度。从 2005 年开始，温家宝总理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别提出了要“抓紧研究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加快实行政绩管理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大力推行行政问责制度和政府绩效制度”。2011 年以来，国家监察部成立了绩效管理监察室，国家建立了国务院绩效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我国的绩效管理的试点和推进工作。

但是，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职能任务转换为具体的绩效考核目标，并与官员的升降奖惩结合起来，这仍然是一个有待突破的课题。长期以来，绩效考核的目标过于偏重 GDP，这有其历史的原因。现在，民众的诉求更强调保障民生和公共服务。因此，绩效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加以改进，将“1E”（经济）导向转变为“4E”导向，即经济性（Economy）、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

ciency)、效益性 (Effectiveness), 用“民生指数”代替“GDP 崇拜”, 并实现内部评估和外部评估相结合, 领导评价和公众评价相结合。

尤其要重视外部评价和公众评价。民生改善如何, 民众感受最深。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 90 周年讲话中所说, 保障和改善民生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要大力拓展公众参与渠道, 满足公众有序参与立法过程、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和参与基层治理过程的热情。公众参与不仅有利于培育群众的公民意识, 也有利于培育官员的公仆意识。建立公众导向、民生导向的绩效评估体系, 对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形成一种约束机制, 有助于把转变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变成政府实实在在的基本职能。

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已经成为我国新一轮发展侧重解决的重点内容之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 “要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忧, 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 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在这样的情形下,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民生中国”系列丛书意义重大。这套丛书是一套大型公益性著作, 是反映中国民生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我认为这套丛书的特点和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

第一, 这套丛书选题具有系统性、全面性、针对性。编者对民生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了认真梳理, 选题规模宏大, 同时重点突出。客观上说, 策划出版这么一套大型丛书是有难度的, 学科跨度很大, 作者天南海北。民生问题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教育学等学科, 该丛书作者或者是国内某一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或者是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 阵容可谓强大。更为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作者基本都有社会调查阅历以及与基层干部群众接触的机会, 有扎实的理论功底, 有战略思维, 又熟悉政策, 能接地气, 这就有可能出精品。这套丛书可以作为广大干部思考、破解中国民生难题的政策工具书, 也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了解中国民生问题的基本参考书。

第二, 这套丛书在民生问题的研究上实现了诸多理论创新, 为我们解决中国民生问题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分析和建议。研究中国民生问题, 既要在已有理论和政策话语下展开讨论分析, 也需要在此基础上

有新的思考、探索和突破。在新的历史时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落实，必须以满足民生发展需求为评判标准。这套丛书从民生的角度重新诠释和界定了发展，丰富和完善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民生既连着内需，连着转型，也连着公平，所谓民生问题，已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和物质福利的改善问题。民生发展需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纠正社会初次分配不公，进行二次分配和公共财政体系的制度改革。但民生发展更需要重视发展中的非物质因素，如公平、正义、宽容、自由等等，需要从维护广大群众最根本利益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协调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丛书所涉及的理论思考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所提出的相应政策建议 also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 年 12 月

目 录

绪论 大学与选择	1
上篇 大学教育理念的选择	8
第一章 大学教育的目的：社会为本还是个人为本	8
第一节 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界限	8
第二节 历史上的高等教育目的：社会本位占主导	12
第三节 社会本位的原因：人对人、人对物的依赖	18
第四节 选择个人本位的理由	20
第五节 实施个人本位的原则	23
第二章 大学教育的属性：“别人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教育”	29
第一节 “别人的教育”	29
第二节 “自己的教育”	40
第三节 变“别人的教育”为“自己的教育”	63
第三章 大学教师的追求：做学官还是做学者	70
第一节 大学里的官与师	70
第二节 学官与学者的职业差异	82
第三节 做学官与做学者宜分二途	87

中篇 大学培养模式的选择	96
第四章 大学的中心：教学还是科研	96
第一节 高等教育的本质	97
第二节 教学与科研的功能	101
第三节 教学为中心的理论后果	107
第四节 科研为中心的历史经验	117
第五节 科研为中心的实施路径	121
第五章 大学重心所寄：专精还是通博	133
第一节 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	133
第二节 专业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140
第三节 通识教育的思想与实践	150
第四节 选择通识为本的理由	161
第五节 实现通识为本的途径	177
第六章 大学生的目标：学会考试还是学会学习	183
第一节 考试与学会考试	183
第二节 学习与学会学习	203
第三节 变学会考试为学会学习	218
下篇 大学运行机制的选择	239
第七章 大学的所有制：公立还是私立	239
第一节 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239
第二节 公立与私立的先后、主辅	252
第三节 体制转型的理论支撑与路径选择	262
第八章 大学的发展方式：趋同还是求异	272
第一节 模式与特色	272
第二节 为何趋同	282
第三节 摆脱趋同	286

第九章 大学的发展过程：行政化还是学术化	295
第一节 大学行政化	295
第二节 行政化的后果	308
第三节 行政化的原因	313
第四节 回归学术化	324
第十章 大学的管理方法：竞争还是协调	324
第一节 竞争与协调	334
第二节 大学的竞争与协调	347
第三节 协调前提下的竞争	361
参考文献	368
后记	370

绪 论 大学与选择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素质劳动者的组织机构，选择是行为主体面对多种事物或状态时作出适合自己目的需要的取舍活动。大学的选择便是大学在面临多种事项时作出适合自己教育目的需要的取舍活动。大学选择是大学作为教育机构的自己的选择，选择的主体是大学自己，政府和社会可能会影响大学的选择，但不应干扰更不应代替大学的选择。大学选择的对象很多，如大学教育理念、大学人才培养模式和大学运行机制的选择等等。在大学理念的选择上，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为本位还是以个人为本位？大学教育的属性是“别人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教育”？大学教师们的追求是做学官还是做学者？在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大学工作的中心是教学还是科研？大学的重心所寄是专精还是通博？大学生的目标是学会考试还是学会学习？在大学运行机制的选择上，大学的所有制是公立还是私立？大学的发展方式是趋同还是求异？大学的发展过程是行政化还是学术化？大学的管理方法是竞争还是协调？诸如此类，便是大学所面临的种种选择。

世界大学发展史也就是世界大学的选择史。世界知名大学的成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他们正确选择的结果。中国大学从古到今，特别是现代大学创办以来，错误的选择多于正确的选择，造成今日只能靠大楼之高、师生之众来自诩为世界高等教育大国，但离世界高等教育的强国却相去甚远。有鉴于此，我们讨论大学的选择问题，当不无裨益。

反思中外历史上的高等教育，有些选择是很成功的，给了后人极为深远的有益影响；有些却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为后代留下了不少负面影响。

在古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选择莫过于孔子约在公元前 532 年开创了独立的私人教育机构，比柏拉图创办阿加德米学园早了 100 年。这一举措打破了自殷商、西周以来国家垄断高等教育的局面，开了民间办“大学”的先河。孔子实行“有教无类”的招生制度，学生来自鲁、齐、卫、晋、蔡、秦、宋、薛、吴、楚等诸侯国，家庭不分贫富，不论贵贱，年龄不限大小。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孔子弟子中有姓名可查的有 77 人，其中贵族和富商出身的仅 4 人，其余均出自平民家庭。此外，孔子选择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也都有开创性。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最糟糕的选择当数隋唐两代皇帝确立了科举制度，自科举制度产生并逐步完善之后，学校便逐渐失去它应有的育人功能，被裹胁进了国家遴选官员的人事机器，走上了一条离本真意义的教育越来越远的不归路。在科举时代，学校基本上都是围绕科举进行考试辅导活动，广大青少年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下，一心只读与科考相关的书籍、文章，而考试范围以外的学问就不再问津。唐初李世民看见众多的考生拥进考场的时候，十分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岂止是他唐太宗，可以说自实施科举后，几乎历代所有的封建帝王都把“天下英雄”收为囊中之物了。然而一千多年后，当科举制经过由生而盛、盛而衰，最后衰而竭的时候，清末光绪于 1905 年在《定国是诏》中不得不哀叹“士无实学，工无良师”，面对“强弱异形，贫富悬绝”的形势，“岂真能制梃以挹坚甲利兵乎？”一个国家弄到“士无实学，工无良师”的地步，教育干什么去了？教育别无选择，早被绑上了科举的战车，充当官员的筛选机器。

从隋炀帝于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开启科考，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宣布废止，科举制度存在了 1300 年。在这 1300 年间，西方人在他们的高等教育史上作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欧洲人从 7 世纪起，就在意大利、法国等地办了很多的法律、医学和宗教学校，许多著名的法学家、医生和神学家在那里进行教学活动。10 世纪，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已成为欧洲医学中心。到 11 世纪，这里吸引了大量来自欧、亚、非各洲的学生。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波洛尼亚在 11 世纪后

半期就有人从事法学教学活动。在此基础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y）在法国、意大利、英国横空出世。巴黎大学、波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帕多瓦大学、萨莱诺大学分别创建于公元1100—1109年间、1150年、1168年、1209年、1222年和1231年。此后，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欧洲各地涌现，到中世纪末，欧洲已建立了80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中世纪结束后，西方人又在大学的制度、学科、课程等领域不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例如：

18世纪末，法国创建了一系列专门学院，其中有机械、军事、农业、医学、兽医等学院。

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选择了洪堡“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办学原则，各大学都设研究班和研究所，使大学的功能得以扩展。

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不支持总统杰弗逊和新罕布尔州政府欲将私立的达特茅斯学院收为公立的诉求，维护了私立高校的合法权益。186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毛雷尔法案》，根据此法案，联邦政府在各州至少资助一所院校从事工农业技术教育，从此各州相继建立赠地学院。这两次选择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走上了多样化发展的道路。

1877年，日本创设了东京大学，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所欧美型大学，比我国北京大学的创立早了21年。东京大学设置了法学、化学、工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采矿学、医学等十多种学科。到1885年，日本还开设了102所专门学院，学科涉及工学、农学、林学等。日本崛起于东亚，与他们的教育选择不无关系。

外国高等教育史上也有一些糟糕的选择，最典型的莫过于“十月革命”后苏联选择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苏联政府剥夺了公民私人办学的权利，确立了所有大学由政府出资举办，由政府提供日常经费并由政府直接管理的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大学的创立与变更，大学校长的产生，以及专业设置、课程结构、教材选编、招生与毕业分配、教师聘任等等“大权”都集中在中央。中央最高领导人甚至直接干预学校的学术问题，任意宣判某学派正确某学派错误，教师除了严格按规定的教学大纲授课外，教学自由、学术自由的权利几乎丧失殆尽。在苏联存在的70年间，高校始终缺乏办学的自主权，国家及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总量日益增加，但效益却越来越差，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狭窄，质量不高。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高等教育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苏联的集权模式，直到今天，仍有其负面

影响。

为什么有些选择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有些选择却是错误的？作出正确的选择——不能靠前人的经验，二不能靠权威人物的指令，三不能靠自己拍脑袋碰运气，靠的是对所选择事物的深刻认识，只有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在盲目状态下所作的选择是自发性、自在性的选择，是不自由的选择。人们欲对高等教育事务作出合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选择，务必对高等教育的规律性有足够的认识，务必达到相对自由的程度。恩格斯认为，自由表示一种能力，说明人们通过对客观事物必然性的认识从而支配和控制外部事物。他说：“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能力。因此，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像是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①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大多是有专长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可能达到了相当自由的程度——对他所熟悉的那个领域的规律性有一定的认识。但是一般来说，他们对高等教育，对大学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可以说，在高等教育的管理领域，他们还相当的不自由。难怪一方面有不少学者强烈呼吁要给高校办学自主权，而另一方面很多大学校长却并不怎么在乎办学自主权。他们宁肯按上级的红头文件办事而不愿自作主张，因为要他们自己作出选择是困难的。既然如此，一旦需要他们作出选择时，就只能“任意进行选择”了。这种“不自由”状态下的选择，往往导致被本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

大学选择的内容，我们可以从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来考察。

1. 物质层面

从物质层面看，大学在校址、校舍、设备、仪器、图书、报刊等等的勘测、设计、建筑、制造、采购、安装等过程中，都要经过选择；学生学费的收取、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确定、教职工工资的发放、教学科研经费的分配、接受赞助、开发创收……凡此种种，都是大学在物质方面的选择。教育家梅贻琦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他看来，大学之所以称大学，全赖有好教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456页。

大师比大楼重要得多。如果大楼与大师不可兼得，梅校长必舍大楼而取大师。当年他执掌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茅屋低矮，设备简陋，但却大师云集，人才荟萃。正是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大师们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的成为新中国科学界、教育界的顶梁柱，有的后来拿到了诺贝尔奖。如今的大学对大楼的兴趣似乎比对大师的兴趣要浓厚得多。校园在一片片扩大，校舍在一层层拔高，校门的装饰一个更比一个豪华；大师却鲜有所见，年老的大师相继驾鹤仙逝，年轻的真正大师却老是冒不出来。这一现象足以说明我们在大楼与大师的取舍上出了问题。

如今的大学里大家都很忙，但是忙创收的多，忙创新的少。一些堂堂的本科大学，甚至有硕士、博士点的重点大学，所办成人教育的“班”多如牛毛，级别从最高档的“国学班”、“大师班”、“研究生班”，到次一级的本科班、专科班，直到低档的“企业家班”、“富二代班”、高考复读班，只要能带来经济效益统统都办。有人早已斥之为“没有出息”。然而人们对创新的热情却相形见绌。为什么？物质利益使然。

如今的大学教师们做官的热情似乎高过做学问。在现实制度下，做官比做老百姓在物质利益方面的优势不言而喻，在学校里做官更有它独特的诱人之处。那就是官员与学者一身二任，官大学问大，学问大官更大，官更大可占有的资源更多，这样的“良性”循环谁不动心？所以眼下大学里的青年才俊一旦在学术上崭露头角，往往立马就要当个处长、部长，不仅眼前可以在学术和官场两头发展，而且往后在科研项目申报、教学成果评奖等方面占据有利位置，好处会滚滚而来。在这种环境下，一心一意做学问的年轻人日趋减少。

2. 精神层面

从精神层面看，大学的创立与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社会整体的发展，为了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还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大学应以社会为本，还是以个人为本？大学的最高价值追求是在于为职业市场提供人才，还是在于探求真理？是求用第一，还是求真第一？大学教育本真的意义是教师将知识奉送和灌输给学生，还是教师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大学教育是教师的教育，还是学生自己的教育？大学应以教为主，还是以学为主？大学是一家家供顾客采购的大型超市，还是一座座照耀、指引人们前进的灯塔？大学应迎合